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近代历史变局中的过渡人物 ——以汤寿潜为个案的考察

Transitional Figure in the Change of History: Tang Shouqian As a Case

孙祥伟◎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学术文库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资助

近代历史变局中的过渡人物

——以汤寿潜为个案的考察

Transitional Figure in the Change of History:
Tang Shouqian As a Case

孙祥伟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历史变局中的过渡人物：以汤寿潜为个案的考察/孙祥伟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 8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5835 - 4

I . ①近… II . ①孙… III. ①汤寿潜 (1857 ~ 1917)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6333 号

策划编辑 王淑珍

责任编辑 孙会香 惠 媚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校对 饶莉莉

责任发行 斯 琴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835 - 4/K · 0185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7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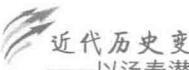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是自近代就开始的，现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物质内容。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了步履蹒跚的融入现代之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强大制度惯性，这一转型不仅并不顺利，还常常险象环生，屡有反复，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人的思想、观念及其主导下的僵化行为，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其时，中国社会除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之外，士大夫阶层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这其中，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士绅，更是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研究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特别是这些国家机器之外的代表性人物的言论、行为与社会作用，就更能显现出其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惯习常使人在自有的思维中难以自拔，一个国家的命运也依然如是。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在近代历史的变局中，传统知识分子的自身转型，其所经历的内心挣扎到接受，是非常之强烈。汤寿潜正是这千千万万追求家国理想的知识分子之一。随着西学东渐，汤寿潜敏锐感到西学中值得借鉴的成分，借助其儒学的深厚功底，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变革主张。作为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和实业家，他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表现，实则是那个转型时代士绅们的缩影。清末十年（1901—1911 年）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既是皇权制度的黄昏，也是汤寿潜这些传统士绅们作用力盛极而衰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杜会思想从传统到改良再到革命，从温和渐趋激烈。社会矛盾的缓冲空间在收缩，冲突越来越刚性化，并且难以调和。

在制度变革的同时，器物文明也发生着重大变迁，中国传统农业的社会基础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在转型过程中，以汤寿潜为代表的中国士绅们对于国家命运与自身转型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士绅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变迁，常常昭示着杜会力量在悄悄地起了变化。晚清士绅



们所经历的时代，在物质方面的进步更为显著，其中对今天社会依然有作用的，当数社会基本面不断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器物营造。彼时，一些现代化工厂开始出现，纺织厂、自来水厂、发电厂、缫丝厂、造纸厂、印刷厂、制药厂、玻璃制造厂等众多民用工厂终结了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了中国工业的现代化道路。在这过程中，士绅们虽然不全是冲在第一线的洋务派，有些在接受上还有个过程，但他们总体上对于新生事物的认可和接受，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唐宋以降，浙江便是中央政府的财赋重地，同时文化名人辈出，文气蔚然成风，如浙东学派所创导的经世致用，成为近几百年来浙江人在实践上的最重要的特征。浙江是属于近代以来较早闻天下风气之先的地方，浙江人身上固有的好读书、勇于实践的特点，在汤寿潜的身上均有很好的体现。汤寿潜的故乡在萧山，这里正是民间力量比较活跃的地方。这里的思想相对开放、充满着活力，易于接受新事物，浙江的第一条铁路——萧甬铁路正是以此为起点。铁路建设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它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发展。在浙路风潮中暴得大名的汤寿潜，为家乡铁路事业奔走的士绅形象，常留在人们的心中，这或许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自我转型。那一代人的转型相对艰难，在面临着传统保守思潮的包围中，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卓识。

士绅是城乡一体时期维持乡村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对于乡村政权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乡村的文化和建设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那个时代乡村比较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数众多的士绅的存在。他们掌握了较高的文化，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人品和学问受到高度认可，可以作为乡村的权威和公义，起着政权建设的辅助作用。士绅是国家和基层社会之间的黏结剂，能够很好地凝聚乡村人心、风气，使得乡村建设在朝着文化、精致、多元、传承的方向保持稳步发展。并且由于士绅的存在，乡村与城镇也常融为一体，在城为官，回乡为绅，也使得乡村的建设和发展始终得到中央政府和精英人士的关注。境况的改变出现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由于废科举所导致的城乡分割，给中国社会的基本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乡村中的精英人士不断逃离，乡村留下来的，真如鲁迅小说《故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贫瘠，正是造成今天我国城乡二元

分割的主要原因之一。身在士绅阶层辉煌而又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的时代，汤寿潜与与生俱来的士绅道德之间的那种冲突，让他在感受着时代飞速变迁带来的不适应的同时，内心有自己的痛苦，也进行着自我调适。汤寿潜曾说，“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这既可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关于义和利的辨识，同时也可从中看出传统与现代在名利上的冲突。在现代化不断加剧的时代里，固守传统士绅的道德观念，常有它的时代局限性。

乡村与农村同属一意，但是感情色彩却有着巨大的差别。传统中国的乡村，是富有文化、精神、组织等内涵的，并且乡村建设是富有朝气和章法的，城乡相连，成为传统中国成长的重要一环。中国乡村的健康、成熟的发展，仍需要有像汤寿潜那样的士绅，这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一个有效的缓冲剂，也是建构乡村社会的文化、诚信和秩序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回到乡村，成为今天知识分子重返乡村社会的理性思考，这也是历史上这些士绅留给我们的思考。犹忆当时乡村繁华盛景，有活力并且追求精致，最重要仍在于有能之士的存在。士绅之于乡村，不啻鱼儿和水的关系。这批主要不是以官职，而是以在地方有威望的士绅的存在，给乡村建设带来了重大的智力支撑和活力，并起到了很好的人才集聚效应，使得乡村治理、人际和谐、文化家园理想更为丰富。

历史和现实常有相似之处。汤寿潜这样的绅士，在国家处于世界大变革中，积极思考国家命运，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维新思想，在世界大势中不断审视国家的发展。更为难得的是，这些绅士不仅在思想层面上，更是身体力行地进行着实业救国的努力，包括以争路权、修铁路的方式进行实践。常以在野之心忧庙堂之事，是典型的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对于家国之事的热情关心，这是值得后人称道的地方。同时，汤寿潜及其他士绅们，通过立宪的方式，极大拓展了社会参与政治的空间，使得清末的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姑且不论这种广泛政治动员的方式是否符合历史的需要，但就拓展社会空间这方面，已是将明清以来社会空间被皇权压缩的一面，进行了重要的拓展，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

如汤寿潜这样的士绅，既有知识分子的家国理想，又有身体力行的亲身实践，是中国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影。同时，汤寿潜还积极著书立



近代历史变局中的过渡人物 ——以汤寿潜为个案的考察

说、修身养性，以儒家道德纲常来约束和警醒自己，不媚时、不媚势，在名、义、利之间保持很好的平衡。“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今天我们不断思考国家发展未来的时候，回顾汤寿潜等士绅们所走过的道路，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无论是他的思想、他的实践、他对于社会空间繁盛的努力，还是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士绅情怀，放在今天来看，仍有着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思考价值。

祥伟博士的大作《近代历史变局中的过渡人物——以汤寿潜为个案的考察》，正是在此恢宏的历史画卷中展开研究。该著史料丰富，论证翔实，可以让学界更好地了解汤寿潜，了解那个时代像汤寿潜那样的士绅们所走过的人生经历，了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所作的个人努力，因此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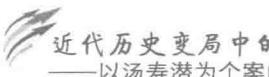
刘训华
宁波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2015年7月

前　　言

汤寿潜是近代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江浙立宪运动的领袖，是清代立宪派中唯一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汤寿潜早年深受浙东经世实学的影响，后来从事政治和教育活动，又成为西学的积极主张者，汤寿潜 1890 年以《危言》的发表奠定了其维新思想家的地位，他坚信能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以拯救当时面临的社会危机，同时坚持“西学中源观”，对西艺、西学、西政都有所借鉴。从发表《危言》、力倡维新到参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倡导国会请愿运动、参与辛亥革命再到最后归隐乡里，不问政事，其人生经历是清末保守型文化精英参与维新—立宪—革命等的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缩影和个案，在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汤寿潜的主要活动也发生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其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性的烙印。在横向方面汤寿潜经历了从农家子弟到幕僚、士子、社会活动家、工商资本家的转变；在纵向方面，他通过科举考试，考取了进士、翰林，在士人群体中登上了一个更高的梯级，一个已经接近统治阶级上层的梯级。尽管他很少出任官职，但是他的声望已经高于他的社会地位，他不再是那个朴实、倔强而又不通世故的农贾读书子弟。他具有了士绅的地位，并且运用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才干谋求家乡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横向方面，他通过参与实业、立宪运动和兴办浙路等各项活动，增强了与商人、官员群体之间的联系，并逐渐与他们有了共同语言，甚至共同从事利益相通的活动，这更扩大了汤寿潜生活与思想的范围。如果说，在士人群体内部梯级的上升，为汤寿潜此后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基础，那么与商人群体的横向联系，则为其兴办浙路与实业活动准备了某些经验与支持力量。

与之相应的是，随着其思想由维新—立宪—共和，其身份也完成了由封建士绅—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的转变。他的观念意识从来没有超出他社会身份所允许的范围。正如美国学者在谈到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时说道：“许多精



英的身份具有变化的轨迹，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适应性。”^① 其好友陆学源评价其“锐于学而善变”，在甲午战争以前，汤寿潜基本上是一个具有爱国心与忧患意识的士绅，虽有革新的要求，但总体上属于旧营垒。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外来侵略的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经世致用的传统形式增添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进入20世纪，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他的思想也与时俱进，积极鼓吹立宪与共和。汤寿潜的每一次转变，基本上都是复杂而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和不可预知的或然性互相作用的结果。他的社会身份的变化极具“适应性”，而他的观念意识具有“模糊性”。严格说来，社会身份决定的汤寿潜和观念意识左右的汤寿潜，是相互包容、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从整体上把握汤寿潜的变化，用复合转变一词较为贴切，也有较强的涵盖性。但是从复合的角度观察时，汤寿潜又是一位由适应性和模糊性交织而成的不折不扣的矛盾人物。

汤寿潜在其后半生（1890—1917）对政治与社会的态度也经历了抗议—疏离—退隐的心路历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由历史舞台的前沿退至幕后，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变化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精英的兴盛与落寞，最终被革命派精英所取代，这本身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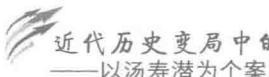
作 者

2015年4月

^① 《血路——革命中国的沈定一传奇》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 论 | 1 |
| 第二章 生平与著作 | 18 |
| 第一节 警世《危言》 | 19 |
| 第二节 著述概况 | 35 |
| 第三章 “互保”与外交 | 51 |
| 第一节 汤寿潜的外交活动 | 51 |
| 第二节 汤寿潜的外交观 | 60 |
| 第四章 新政与立宪 | 69 |
| 第一节 汤寿潜的立宪活动 | 69 |
| 第二节 汤寿潜的宪政思想 | 80 |
| 第五章 保路与革命 | 90 |
| 第一节 汤寿潜与浙江保路运动 | 90 |
| 第二节 保路运动与江浙绅商分化 | 99 |
| 第三节 浙江都督 | 105 |
| 第六章 实业与教育 | 125 |
| 第一节 汤寿潜的实业活动 | 125 |
| 第二节 汤寿潜的实业救国思想 | 129 |
| 第三节 “教育为文明之导师” | 142 |



| | |
|----------------------|-----|
| 第七章 前进与保守 | 155 |
| 第一节 汤寿潜的人际交往 | 155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观 | 165 |
| 余 论 历史变局中的过渡人物 | 174 |
| 参考文献 | 177 |
| 参考资料 | 186 |
| 附录一 汤寿潜史料辑释 | 188 |
| 附录二 汤寿潜年谱简编 | 283 |
| 后记 | 314 |

第一章 絮 论

一、选题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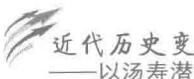
(一) 研究缘起

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宗法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的转型，中国近代化转型主要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心理”层面的转变过程^①。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在内在要求和外在压力双重作用下进入实施阶段。变革的三个阶段，都存在着向西方还是向传统寻求变革资源的问题。

面对西学东渐的社会变局，汤寿潜、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曾提出“西学中源”说，借以会同中西文化，而当时晚清经世实学的兴起，为西学与中学的对接提供了渠道。但是，在中国近代转型的器物—制度—文化心理三个层面，文化心理层面最为艰难，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表现得较为剧烈，中国以道德立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至上在价值观念上形成尖锐矛盾，如康有为的“西方物质、中国道德”，梁启超的“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孙中山的“西方科学、中国国粹”，梁漱溟的“西方理智、中国理性”等，均揭露出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分立、矛盾、冲突。

汤寿潜的主要活动也发生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其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性的烙印。在甲午战争以前，汤寿潜基本上是一个具有爱国心与忧患意识的士绅，虽有革新的要求，但总体上属于旧营垒。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外来侵略的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经世致用的传统形式增添

^① 近代中国社会的三阶段模式较早出现于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的论述，今人殷海光、金耀基、庞朴等先生也提出相近的观点，近年来虽然学界多有批评，但笔者认为仍有可取之处。



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进入20世纪，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他的思想也与时俱进，积极宣扬立宪与共和。汤寿潜的每一次转变，基本上都是复杂而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和不可预知的或然性互相作用的结果。他的社会身份的变化极具“适应性”，而他的观念意识具有“模糊性”。严格说来，社会身份决定的汤寿潜和观念意识左右的汤寿潜，是相互包容、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从整体上把握汤寿潜的变化，用复合转变一词较为贴切，也有较强的涵盖性。但是从复合的角度观察时，汤寿潜是一位由适应性和模糊性交织而成的不折不扣的矛盾人物。

汤寿潜在其后半生（1890—1917）对政治与社会的态度也经历了抗议—疏离—退隐的心路历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由历史舞台的前沿退至幕后，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变化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精英的兴盛与落寞，最终被革命派精英所取代，这本身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缩影。

（二）研究意义

1. 学术意义

汤寿潜的思想深受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实学影响，同时又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从而在中西交汇中构筑自己的强国理想。本书主要探讨这两种思想对汤寿潜的影响及其具体维新举措。从汤寿潜一生的思想轨迹和学风转变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尊奉儒家传统理想的知识分子，同时对西方思想也有吸收和借鉴。就近代中国思想史而言，汤寿潜虽不是一流的思想家，但其思想也不乏真知灼见，对近代中国具有很大影响。因此把汤寿潜的思想放到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确有必要，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 社会意义

汤寿潜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又是浙江立宪运动的领袖，是清代改良派中唯一一位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又是近代宣扬“立宪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在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选择汤寿潜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有其特定的价值。

首先，从政治史的角度，汤寿潜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策划东南互保、领导预备立宪公会和浙江保路运动、参加辛亥革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过

程中始终能够与时俱进，成为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其次，从教育文化史的角度，他笃信“教育救国”理念，先后出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湖州南浔浔溪书院山长，在上海参办会文堂书局，在浙江创办杭州初级师范学校、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晚年捐资 20 万银元建立浙江图书馆；同时著书立说，宣传变法、立宪思想，探究典章制度的源流。

最后，从社会史的角度，与汤寿潜交往颇深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各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方面大员有瞿鸿禨、翁同龢、刘坤一、张之洞、锡良，实业家有张謇、盛宣怀、刘锦藻等；革命家有孙文、陈其美、蔡元培、褚辅成、陶成章，文人有张元济、俞樾、马一浮、弘一法师等人。这些人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共同演绎了晚清民国舞台上一幕幕历史活剧。

通过对这个人物及其生命历程和心路轨迹的剖析，可以透视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精英探索的社会过程以及影响这个过程的各种因素，客观地再现中国近代化潮流中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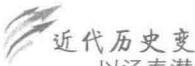
二、研究概况

（一）研究综述

汤寿潜去世后，最先对他进行评价的是张謇，他在《汤蛰先先生家传》中回顾了汤寿潜一生事迹，指出其“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评价其“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①，但仅仅是一篇家传，浮光掠影，尚难言盖棺定论。真正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支南钰一郎于 1935 年发表的《浙路风潮汤寿潜》。该文章详细探讨了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的主要活动，高度评价了其在担任浙路公司总理时，领导浙路运动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及政治勇气，称赞其“弃按察、提学使之高贵，而屈就铁路总理之职，不计目前之小利，欲大有造吾浙之群民万世之利”^②，但仅仅局限于其在铁路风潮中的表现，尚欠全面。宋慈抱在 1948 年《国史馆馆刊》第 1 卷 2 期中有《汤寿潜

① 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125—128 页。

② 支南钰一郎：《浙路风潮汤寿潜》，《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129 页，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传》^①，简述其一生事迹，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

长期以来，大陆学者囿于革命史观，对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群体多习惯于宏观叙事，且缺少客观评价，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者对于这位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关注不够，1987年宗志文、严如平编写的《民国人物传》（第6卷）列有《汤寿潜传》，成为新时期学术研究升温的开端。1991年陈志放先生编写《平民都督汤寿潜》一书，虽然仅12万字，却是迄今为止问世的唯一一部关于汤寿潜的传记，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汤氏一生的活动及业绩，加深了人们对汤寿潜的了解，足具筚路蓝缕之功，良可告慰先贤，可惜不具学术价值。

台湾学者对汤寿潜的研究有三篇论文，主要是对汤寿潜的生平作事实性的叙述，对其在浙路商办中所起作用给予积极肯定，但对其思想并未作出深入探讨。^②

学界以往对于早期维新思想家群体，更多地关注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对汤寿潜的研究尚显薄弱，其实，汤寿潜是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他虽没有康有为、梁启超那样轰轰烈烈，叱咤风云，但却以思想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3年萧山市文史工作委员会出版《萧山文史资料选编·汤寿潜专辑》，整理出版了汤寿潜在立宪运动、浙路风潮与辛亥革命期间的著作、奏折、家传、书信与函电，成为研究汤寿潜生平的重要资料。1994年10月，浙江省萧山市召开汤寿潜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汤寿潜研究》。学术界开始重视对他的研究，对其政治活动和教育观、历史观及人才思想、经济思想进行了热烈讨论，近年来，学界对此热情不减，前辈学者来新夏、章开沅、茅家琦、熊月之都有专题论文问世，对汤寿潜研究起了推动作用。目前，学界研究汤寿潜的专题论文有40余篇，硕士论文两篇。对于汤寿潜的研究概况，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 该传略附《刘锦藻传》，共2334字，对汤寿潜生平做了简要介绍，承蒙台湾国史馆修纂处处长简笙簧先生提供扫描图片，谨表谢忱。

② 竺公：《汤寿潜与浙路》，《交通建设》，20：4（1971），第34—39页。

关志昌：《汤寿潜（1857—1917）》，《传记文学》，44：4（1984），第137—139页。

卜曹元：《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汤寿潜》，《浙江月刊》，33：2（2001），第3—4页。

本资料承蒙台湾中央研究院唐立宗博士提供上述信息，谨表谢忱。

(二) 汤寿潜研究的主要论题与观点

1. 生平

汤寿潜是近代早期维新派的著名代表、江浙立宪运动的领袖，是清代改良派中唯一一位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于汤寿潜与几个重大事件的关系，学界的研究较为深入。

(1) 汤寿潜与浙路风潮。张謇评价汤寿潜“晚以铁路见贤”，杭州大学郑云山在《汤寿潜与近代中国的“铁路兴国论”》一文中，论述了汤寿潜为浙江铁路建设廉洁奉公、刻苦自励、计划周详、虚心纳言、不畏艰险、力捍主权的业绩，认为主持浙江铁路是汤寿潜一生最具深远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铁路史上熠熠生辉的篇章。^① 周章森撰文叙述了浙江沪杭甬铁路争取商办主要进程，并高度评价了其历史功绩，指出浙路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发起最早、成效最为显著的拒借款保路权的爱国运动之一，比粤汉湘川保路运动发端早四年，开全国挽回利权之先声。汤寿潜以其坚决态度与干练才能所做出的贡献，永为后人景仰。^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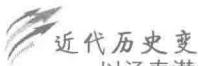
朱馥生把汤寿潜《东南铁道大计划》与孙中山《实业计划》铁道建设部分做了比较研究，认为孙中山、汤寿潜在政治立场上虽有革命与立宪之别，但在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上殊途同归。汤寿潜在办路中依靠铁路集资、土地折股、民营民办，对于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中资金问题及经济体制改革仍具借鉴意义。^③

(2) 汤寿潜与东南互保。过去一致认为参与东南互保是汤寿潜政治生活上的一大污点，它保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侵略利益，是卖国投降的行为。但是戴东阳认为，应当把东南互保置于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下重加考察。她认为汤寿潜发起这个运动是萌生于救国救民初衷，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维护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的愿望，它使南方免受战争蹂躏，又对维

^① 郑云山：《汤寿潜与近代“铁路兴国论”》，《汤寿潜研究》第43—58页。

^② 周章森：《汤寿潜与沪杭甬铁路》，《汤寿潜研究》第97—107页。

^③ 朱馥生：《孙中山〈实业计划〉的铁道部分与汤寿潜〈东南铁道大计划〉的比较》，《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



护南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① 郭士龙也认为东南互保要害是对后党集团的公开对抗，以共和派、立宪派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改革派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外开放，旨在维护正常的对外交流，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故而汤氏参与其中是进步的、改革者的立场。^②

(3) 汤寿潜与秋瑾案。1907年7月，秋瑾因与徐锡麟分头策划浙皖起义，在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捕杀。关于秋瑾案的各种传言，也在浙、沪流布，其中包括汤寿潜与秋瑾案的一些传闻。作为汤寿潜研究的先行者，郑云山先生通过分析故宫档案馆收藏的《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及由陶成章后来收入《浙案纪略》的电函、奏报等原始史料，得出结论：人们责备汤寿潜对秋瑾案态度冷漠，是理所当然；而说他参与制造秋瑾案，则事出有因，却是查无实据。郑先生通过翔实的史料为汤寿潜辩诬，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③

(4) 汤寿潜与辛亥革命。以往囿于汤寿潜的立宪派身份，学界大多认定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是“攫取”革命果实。章开沅先生在《论汤寿潜现象——辛亥革命的反思之一》中指出，将多年反对革命的汤寿潜推上革命政权的首脑地位，冒失离奇，其实却有合理解释：这与汤寿潜本人具有的社会声望、东南区位优势、较大的社团网络以及在浙路风潮中的成功密切相关，至于将汤寿潜出任都督视为窃取显然过于武断，因为他出任该职是革命派请出来的，而不是自己钻进来的；汤寿潜在都督任内所作所为，基本上值得肯定；虽与某些革命党人有过争执，但都属于政见争执，而且经常处于孤立与弱势地位。^④ 丁贤勇教授着重从军政府和都督府的构成分析得出结论：都督府的最高层权力尤其是军政大权基本上控制在同盟会手中，都督府下属各部部长席位也基本为革命党人所掌握。由此可见，汤寿潜“窃权”不能成立，汤寿潜在军政府中基本处于被暂时利用的角色。^⑤

陶水木教授主要从汤寿潜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这包括倡议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确定总统人选和建都地点等方面，表现出其为尽早结束独立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内外政策，维

① 戴东阳：《东南互保与汤寿潜》，《汤寿潜研究》第217—224页。

② 郭士龙：《张謇、汤寿潜也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汤寿潜研究》第176—188页。

③ 郑云山：《汤寿潜与“秋案”关系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章开沅：《论汤寿潜现象——辛亥革命的反思之一》，《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⑤ 刘坚、丁贤勇：《第一任浙江都督汤寿潜》，《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